

伍連德傳

徐民謀節譯

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

一九〇六年

序

大約一九二三年間，恩師高德那會督教我讀英文的時候，順便提到中國有一位大醫生，名叫伍連德，對於防疫事業有極大的貢獻。

高德那會督熟悉中國的內情，他的夫人又是一位醫生。他所說的每句話對我都有極深刻的印象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一下子就是三十年。大約一九五三年間，陳維龍兄約我到國泰酒樓去和伍連德醫生相會。慕名甚久的我，一見伍連德醫生，恨不得三句話做一句擠出來。他的體格魁梧奇偉，態度從容不迫，他說英文還帶着家鄉口音，但文法是正確的，句子是熟練的。由談話中，我知道他曾搜集了不少中國的醫書，而且寫過好幾本關於這一類的書籍。

談到醫學，我是個門外漢，不敢妄贊一詞。但是，我時常覺得，中國的人口在世界佔第一位，這和中國的醫藥不無關係。假如中醫多懂得一些現代的生理學、解剖學、檢驗血液、檢驗大小便、運用聽筒、打針、照X光等技術，西醫多研究一些中國的針灸、藥物學，彼此互相切磋，互相觀摩，真正達到『學貫東西』的地步，這對於整個人類不消說是個大福音。

無情的歲月，老是在那兒催促，轉眼間又是五年。一九五八年的秋天，我負責南洋學會的研究組，我的首要工作，就是聘請伍連德醫生給我們作學術演講。蒙他很慷慨地一口答應，講

了一個鐘頭，每個聽衆都覺得十分滿意。他的題目是古代中國的旅行家。接着，他又談到現代中國的留學生，從伍廷芳、辜鴻銘，到他自己，前後列舉十位。雖然他的演講缺少系統，但材料却很充實。因爲林文慶博士沒有被提及，所以他講完後，我便提出這麼一個問題。他說，林博士是他的姻兄，不便詳述。但我心裏想，他既然像梁啟超寫『清代學術概論』一樣，把自己的功績也敘述了一大篇，爲甚麼不把林文慶博士提一提？這恐怕是他的忽略，但不是有意這麼安排。因爲在他的自傳裏，林文慶博士的大名，他曾提過好幾次呢。

平心而論，我對於政治、軍事、經濟上的風雲人物，平素不大重視，獨文壇藝苑的能手，往往會使我佩服到五體投地。就海外華人而論，在國際卓著聲譽的，應該推馬來亞的華人，其中第一代的大人物，如辜鴻銘、林文慶、伍連德，都算是有極大的貢獻。他們生長於南洋，受業於英國，服務於中國和馬來亞，把中、英、馬的特點融滙於一爐，造成國際間文化交流最好的榜樣。『清史稿』把嚴復、林紓、辜鴻銘三人合併爲一章，那是從翻譯的立場來分類。假如有人要寫馬來亞華人的歷史，那麼初期的大人物，當然要數到辜鴻銘、林文慶、伍連德這三位。

辜鴻銘的名士的習氣太重，生活放蕩不羈。他對於文學和哲學都有高深的造詣，可惜他所表現出來的僅佔他的智慧的極小部份。林文慶是馬來亞的一顆彗星。從他由愛丁堡回到新加坡後的三十年間，他真是唇鎗舌劍，旁若無人。他曾以殉道者的精神，擔任廈門大學校長的職

務，可惜環境特殊，使他沒法子有驚人的表現。等到他從廈門重返新加坡後，他已覺得江山依舊，面目全非。除家產蕩然以外，他還受了許多不必要的刺激。接着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新加坡淪陷，在敵人的刺刀下委曲求全，他的內心的苦悶，不問可知。他整天借酒澆愁，爲的是麻醉自己。他雖然活到八十七歲高齡，事實上，最後的一二十年間他老是頹唐不堪，對於社會早已不發生決定性的影響了。

伍連德則不然。他雖然應中國政府之聘，前後擔任『御醫』及『總統府醫官』，但他的生活比較嚴肅，所以老年重返北馬之後，他還能夠行醫。業餘之暇，他曾前後費了六年工夫，寫了這麼一本洋洋五十萬言的英文自傳。

本書原名「瘟疫的戰鬥者——一個現代中國醫生的自傳」。全文共二十四章，插圖二十二幀，堪稱圖文並茂。

作者以防疫專家出名，所以本書開宗明義，便用四章的篇幅來敘述『黑死病』，從病源到治療，從預防到功績，寫來有聲有色。

我常覺得，一個大廚子，只要把握住兩三種拿手好菜，他便可馳名海內；一個大畫師，只要傾畢生的心血，繪出兩三幅蓋世的名畫，他便可永垂不朽。同樣的，一個科學家，只要有兩三重要的發明或發現，他就被世人推崇備至。

伍連德醫生，剛從英、德、法研究熱帶病回來，滿腔熱血，要爲人羣效命。湊巧一九一〇

至一一年間，東北發生一種極嚴重的傳染病，不幸染病而死的達六萬人之多。那時，羣醫束手，獨伍連德醫生敢運用他多年研究的心得，積極探索病源，然後對症下藥。接着，他得到中國政府的幫助，全權控制交通機構，凡是傳染區域，火車不許開行。再進一步，他實行隔離病人，火葬傳染病的死屍。他執法如山，一點也不含糊，不到四個月工夫，這種震驚全世界的傳染病，同時，也是十四世紀以來最大的傳染病，居然消弭到無影無踪，而伍連德醫生的大名也由此廣播海外，大家公認他爲『黑死病』最有力的鬥士。

伍連德醫生功既成、名既立之後，各國著名大學的榮譽銜頭，好像雪片飛來。其實，榮譽的銜頭，對於一個人的作用，好像糖菓之於小孩一樣，要求最迫切，效用最廣大的，僅是最初所得的榮譽的銜頭，以後榮銜越多，效用越少，連他本人也不怎樣重視了。

但是，少年得志的伍醫生，極得中國政府及社會的信任，無論北洋政府也好，國民政府也好，誰都要借重他。反正醫學是沒有國界的，只要你在學術上有高度的成就，漫說本國內前後不同的政府都要引以爲榮，甚至外國的政府也十分推重。兩年前榮獲諾貝爾科學獎金的中國留美學生楊振寧、李政道，就是個顯著的例子。

伍醫生雖見重於中國政治領袖，但他仍嚴守崗位，百變不離其宗。他對於防止霍亂，禁吸鴉片，建築醫院，提倡衛生等工作，都始終不懈地努力進行。此外，他還參加幾次國際醫學會議，使外國人對中國的醫藥衛生等問題有更深刻的瞭解，這在溝通東西文化上不能不說是個大

貢獻。

談到伍醫生的爲人，他也有好幾點值得人稱道。他愛好書籍，除中國醫學史和防疫問題的專門著作外，他曾大量搜集和閱覽哲學、歷史、文化、藝術的名著。當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的初期，他準備離開中國，重返馬來亞之前，他曾把他的心愛的書籍裝好三十九箱，不幸這些書全部遺失，始終找不出它們的下落。

但是，他重返馬來亞後，收藏和閱覽書籍的習慣仍舊沒有改變，積二十年的辛勤，他的書房又有二千多冊新書了。

除書籍外，他在中國期間會養成收藏古董的嗜好。一來他當時的收入比較優裕，二來他所結交的朋友多是收藏家，所以他對於書畫和古董的鑑賞力也比較普通人高一籌。年前他曾捐贈一部分名畫給馬大博物館，後來他又想把他所收藏的書籍捐贈一家圖書館。我想這事情，正在建築中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不妨跟伍醫生的家屬接洽。

伍醫生親受英國劍橋大學及瑪麗醫院的益處，所以當皇家亞洲學會要在上海建築會所的時候，他便很慷慨地自動捐助三千鎊，約佔全部建築費的三分之一。這種感恩圖報，及崇尚學術的精神，可說是東西文化交流後最好的產品。

當本書於去年出版的時候，我就向南洋學會同仁建議，把它譯爲中文。真是人同此心，我的建議得到全體理事一致通過。不過原書長達五十萬言，非本會及一般讀者的能力所能負擔得

一起。因此，我們才決定採用節譯的辦法。

談到譯書，友人徐民謀先生的確很有經驗。他曾經節譯過『羅斯福傳』、『門庭喜氣』、『羣鴛亂飛』等作品，大受士林尊重。自徐先生接受南洋學會的邀請後，他便很認真地把本書研讀兩三遍，去蕪存精，費了四個月寶貴的光陰，才把譯事告一結束。

伍連德醫生非常重視他的自傳的中譯本。他希望這部中譯本提前出版。誰料年底期間，書局特別忙碌，排印事情一再延遲，使中譯本在沒有面世之前，原著者伍連德醫生已歸道山。每一念及，心裏十分難過。

伍醫生的功業文章，已經在國際上享譽五十年。現在隨中文節譯本的出版，一般讀者也能夠深切體會到他的偉大，同時，也使他們加強自信心。

最後，我還要說句話。本書的出版，除得到南洋學會全體會員的支持外，會長黃曼士先生的指導，陳育崧先生和陳維龍先生的鼓勵，及譯者徐民謀先生的辛勤，都值得我們銘記。

連士升

一九五九年舊曆除夕誌於新加坡雲海樓

第一章 黑死病

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個嚴冷的下午，東北的哈爾濱火車站來了一位年輕的中國醫生，他的身材並不高，不過五呎五吋，他的右手執着一個英國製的中型的顯微鏡，配着研究細菌工作的必需品。和他同車的是他的助手，一位瘦長的廣府人，他帶着酒精、試管、剪刀、簞子，及其他實驗室所需之物件。

這位醫生便是伍連德；他的助手名叫林家瑞。伍醫生在以往三年中擔任天津帝國陸軍醫科大學副監督，家瑞乃是該大學的高材生。他們自接到外務部（即今日之外交部）的命令後，即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往東北，首先經過山海關，再至奉天，現在到了哈爾濱了。

當地的海關監督派人來迎接，並照料行李。他們寄寓於一個俄國籍的猶太女子所開的一個旅館裏，頗覺舒適。

二十五日是耶穌聖誕，西洋國家慶祝得很熱烈，但這兒沒有這種風俗，無論中國人或俄國人都置之不顧的。商店依然開市，貿易如常。他們二人便於該日早晨親往道台衙門訪問。這道台是一個瘦長的人，他的身材大約五呎八吋。他姓余，江蘇人，打起官話來，有點上海音。他曾研究中國古典文學，得中舉人，惟他沒有學過英文和俄文，辦事頗覺困難，因這兒是俄國人的勢力，須善為應付的。

自日俄戰爭（一九〇四——〇五）以後，日本佔據了自大連至長春的一段南滿路，開始與俄國爭取中國之東三省，也就是聞名世界的滿洲。

這塊地區的面積，相等於德國、法國、瑞士三國之總和，而且物產豐富，如大豆、麥、黍等，及其他礦物，如金、鐵、煤等，應有盡有，可是當地的人民不知開發，任其自然，故爲日俄兩國所垂涎。

伍氏來哈的重大使命，是爲抵抗疫疾，事前外務部曾電告余道台以伍氏之任務，故二人覲面後，即談商正事。伍氏感覺余道台所供給的關於疫癘的消息，多屬浮泛的，簡略的，但是很嚴重的。其中有一種病症，先發熱、咳嗽、吐血，不久即死亡，死後，皮膚呈紫色。這種病是在附近哈爾濱，擁有二萬四千人的小城市傳家店發現。滿洲里一帶的俄人恐是最先染到的。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爲業之山東移民，患得更多。他們將鼠捕來，剝取其皮，染以顏色，冒充黑貂，售與西方婦女。他們都是個子高大，身體堅強的人，能在草原中隱伏多日，不畏寒冷，靜待鼠子之出現，餓時則取出乾糧，聊以果腹。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，即往客棧居住，靜候顧主之光臨。如果一人患有疫疾，即可傳染整個客棧，再延至他處。

九月間即發現此種咳嗽吐血之病症，以後越來越多，居民乃開始向東南方逃避。很多是乘中東路向着哈爾濱進發。這條自滿洲里至哈爾濱的火車共有五百三十哩長，乘客紛紛向各站下車，其中已有患疫者，因此把疫病散播開來，哈爾濱亦不能幸免。

在這傳家店裏已有兩個醫生處理疫務，一位是姓姚，一位是姓孫，他們都是天津北洋醫科大學之畢業生，係由滿清熙良總督由奉天送往者。不過他們的工作，只是將病人遣至一定的地區，如果死亡，則為之購棺木和埋葬，談不到甚麼醫治和處理。可是患疫者不斷增加，事態便呈嚴重化了。

伍連德到了哈爾濱，余道台提議，他（伍氏）應做下列各事：

1. 拜訪鐵路最高當局賀威將軍及各國領事。
2. 參觀華人居住之地區和醫院。拜訪傳家店之首長與警察總監，藉以獲得更多之情報。
3. 拜訪俄人開設之醫院及俄國同僚。
4. 向他（道台）及北京之中央政府提供意見。

伍醫生經過一番考慮，決定先去訪問傳家店市內之中國同僚。他和一個助手坐了一輛俄國式的四輪車出發。沿途所見，都是一袋一袋的大豆，剛從田間收穫的。這些大豆，既肥且壯，為任何國家所不及的。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奮地工作，然間有談論吐血發燒之疾病，足見瘟疫之潛勢，已印入人心了。

不久馬車在一所平屋停下來，屋子上寫着『總商會』字樣。當他們進入時，只見姚孫二醫生已在那兒迎候。姚醫生乃廣東人，為伍氏之同鄉，孫醫生則為福州人。照姚醫生的見解，這種疫疾是由肺而起，過去一月患者不多，每日只一二起而已，後來逐漸增加，至當日聖誕節，

已有十餘人喪命。由於人手不足——全市僅有兩個醫生，五個看護處理其事——故病人一到，即藉當地警察之幫助，把他們送往疫房——原來是一間公共浴室，為政府所徵用的。隔離工作尚未實施，以致傳染者很多。屍體常在馬路上出現。這是居民在晚上拋棄，以免官府查究的。政府經常購買廉價棺木，為之埋葬。如果一個人死在室內，則善後之事，可由其親戚為之主持。

經過一番會談後，伍氏便請姚醫生帶他去見傅家店的陳縣長。縣衙門近在咫尺，本可步行而往，可是要表示適當的儀容，他們還是乘車前去，並呈上卡片。他們被領到一間黑暗而不雅觀的會客室，牆壁似乎好久沒有洗刷，而且佈着蜘蛛網，椅子雖是新式的，可是上有灰塵。這可說是古舊的，落後的中國的一般情形。不久，縣長出來了，他穿着一件寬大而頗醜陋的長袍，沒有給人一種有效率或可靠的印象。講起話來，吞吞吐吐地，缺乏準確性。他好像是抽雅片的，如果查出，可能丟官的。他對於我們的問話，顯得很窘，因此他便馬上叫他的警察長前來應付。這位穿制服的警官給我們更多的關於疫癘的消息。不過他們二人都說，一切應做的事都做了，如果他們（兩位醫生）有甚麼高見，都願意加以考慮的。伍氏便說，他是奉命前來調查，最好是警察能帶他到一個病人處，以便詳細詢問。後來見到這些官僚對於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多大幫助的，因此談了片刻，便興辭而出了。

在這兒，不妨談一談伍醫生的助手林家瑞，他雖然不是一個大學畢業生，却是一個很有價

值的同伴，因他能寫中文紀錄，有時須向不識英文之官員有所解釋時，他能代爲口譯。伍氏爲海外華僑，當然對於中文之造詣不會很深。他寄他的上峯施肇基的文件，可用英文，惟有時向各省長官報告，則不得不用中文矣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他先將函電用英文擬好，然後交與林君譯成中文寄出。

施肇基誕生於中國江蘇省，先讀中文，再讀英文，後來被送往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，獲得碩士學位。回國後，被任爲前往歐美考察各國憲法之一九〇五年帝國使節團之團員。當該使節經過板城時，伍氏才和他認識。由於施氏的才具卓越，不久奉命爲外務部秘書。一九〇七年，他受哈爾濱道台之職，也就是余道台的前任。如果施氏尙在其位，則對於伍醫生的工作，當更加便利了。

伍醫生最初之任爲瘟疫調查員，便出於施氏之推荐，後來又被委爲自東三省至山東整個地區之防疫組織之首領。施氏知道東三省情形特殊，如果中國不迅速將疫癘撲滅，則虎視眈眈之日俄兩國勢必橫施政治壓力，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他知道伍醫生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，獲有醫學博士學位，而且他在英、德、法國專門研究細菌，學術深邃，見識廣大，付以防疫重任，最爲相宜。施氏保荐成功後，即電召伍氏至京，後者當時正在天津帝國陸軍醫科大學任職。自伍氏來哈爾濱供職後，他常將此間防疫情形，向施氏報告。

十二月十七日，傅家店一位開客棧的日本女子突然死去，死前也有咳嗽吐血的症候的。伍

醫生決計把她作一死後的檢查。他帶了他的助手，携了一隻藥袋，裏面放着檢驗所需的工具。到了那裏，只見那女子穿了廉賤的和服，躺在一間黑暗而不整齊的屋子裏。他們先把她的胸部的軟骨部份移去，然後將注射器插入她的心房，抽出兩管血，後來又在肺和脾上取出血液，均放在薄片上，以資檢查。他們工作得很快，因為他們不願意使人知道。一俟手續完畢，他們即將屍體縫好，放入政府購備之棺木中，以便埋葬。

患肺炎疫者之死後檢驗，在傅家店裏還是第一次——或許在整個東北。當時還沒有適當的實驗室，只好在總商會借了一個房間應用。他們用高度的顯微鏡檢驗片上的血液，從而斷定心，肺，肝，脾之狀況。他們已發現橢圓形的疫菌，及其特殊的組織。他們一面將發現經過報告北京當局和當地官吏，一面還請余道台，縣長，及警察長都來視察顯微鏡下的細菌，使他們深信不疑。

這是很清楚的，現在必須建起防疫的工作，因此伍氏除向北京報告病情外，復建議下列事項：

1. 在傅家店發生肺炎疫之事，已由醫學上證明完全真實的。
2. 這病正在蔓延中，現在應集中全力與以消滅，至於鼠疫，不妨暫與放任。
3. 從滿洲里到哈爾濱之火車必須嚴格管理，並請俄國當局與中國政府合作。
4. 公棚的道路和冰凍的河流，對於疫病的散佈，也不無關係的，應組織一巡邏隊，以資

監查。

5. 應請傳家店之官吏，多配給屋子以充醫院之用，同時受疫者之親屬亦須另爲安頓，以免疫疾傳播。

6. 應向南方徵求更多之醫生與助手。

7. 應請當地之道台設法籌款，以作防疫之用。

8. 京奉路（北京至奉天）之衛生狀況必須與以注意，如有疫病發生，即宜實施嚴格步驟，如設立防疫醫院及拘留營等。

9. 應請日本南滿鐵路當局合作。

姚孫二醫生已在市區北部，租了一所房子，作爲消毒站，裏面存儲了許多生硫黃和石炭酸，都是從日本葯房買來的。姚醫生對於消毒頗有研究，他常把硫黃放在罐裏，燃燒起來，發出濃烟，以殺死在空中飄浮之細菌，又將石炭酸用四十倍之水沖淡，在屋內四處噴射，以驅除污穢。

消毒站中一個房間是用作實驗室的，伍醫生便在這裏放置他的顯微鏡，幻燈片，及其他醫學上的用具等。他很奇怪地見到一位日本醫生已在實驗室工作。他能講一點中國的國語，據謂他是被南滿鐵路派來調查瘟疫的。不過他的工作，似乎專捉老鼠，以驗是否有毒。伍醫生告訴他，現在的疫病，是人與人的傳染，對於鼠類並無多大關係。惟他似乎不甚相信。

爲了關於防疫問題的商討，伍醫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訪問俄國鐵路局總總督賀威將軍。他是一位六呎二吋的高個子，但是一點沒有架子，他的態度顯得和藹可親，他的智慧從他的目光中流露。他的譯員是朱汝清，乃蘇州人士，能講中俄英法四種語言。在監督室中所會到的其他人物，尚有波蘭人埃新斯基，係鐵路局醫藥處的主任，俄人柯契洛夫，係哈爾濱俄國防疫局的局長，及鐵路醫院高級警官波古契。這幾個人對於伍氏以後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的。

他們的會談是用英語和俄語的，由朱氏口譯。伍氏聲稱，他是奉北京外務部之命，來此調查疫病的，並謂已在傅家店一度作死後檢驗，證明死者所患的是肺炎疫。俄國人員對於此項報告，感到非常興趣，埃新斯基醫生則請將所攝底片給他一看。

賀威將軍強調該區疫癘的嚴重性，並謂中國市區中雖有伍醫生主持防疫事宜，然人數殊嫌不足，最好能再增添幾位醫生，並擴大衛生組織，其他還得多設醫院與隔離營。伍氏便問將軍，鐵路管理局能否借給幾輛貨車，以安頓病人家屬，使他們不致傳染。賀氏遲疑了一下，謂還得與局員商量，不過他說，凡他能力所及，無不樂於幫助的。他亦稱，疫病已在鐵疫區發現，華人與俄人均有患者。最後，他歡迎伍氏於得暇時參觀俄人建立之病院。

新年的前夕，伍醫生出發拜訪日俄兩國總領事，同時也拜訪英國，法國和美國的領事。惟在這幾個領事中，只有美國領事表現得最好。兩位總領事似乎關心政治的成份比較疫疾爲多。英國領事則顯得冷淡，並且對於中國人的防疫能力，有點懷疑似的，不管伍氏誕生於板城，亦

屬英國籍民。法國副領事乃是本地商人，只有伍氏談到曾在巴黎研究院肄業時，才感到一些興趣。

美國領事洛奇格林，乃哈佛大學畢業生，身材高大，態度友善。他了解中國人面對疫癘的危險，惟謂如果有良好的組織和防止的決心，則沒有理由不收成功的效果的。這確是對於新自防疫重任的醫生一種必要的鼓勵。他還邀請伍氏隨時前往商談，如果有此必要。格林領事後來升為漢口總領事，親見一九一一年中國大革命之發生。

疫病發生之報告，在中國市區和鐵路區，均不斷而來，應亟設法制止。伍醫生乃首先訪問俄國防疫醫院，見其醫生哈夫金。這位青年醫生畢業於俄國基輔大學，這時還不過二十八歲而已。他的叔父是一個著名的醫生，曾在印度之孟買主持防止鼠疫的工作，且發明一種以死菌製成之防疫注射液。哈夫金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袍，戴着白帽，但不用口罩。伍醫生進入疫病室之前，也受到同樣的衣服和帽子。

這正是一個難題。伍醫生該要求口罩嗎？不會被譏笑缺乏勇氣嗎？就這樣和他一同進去，一切諉之於命嗎？可是已經到了門口，要提議也來不及了。裏面有八個病人——六個中國人，兩個俄國人。他們都發高熱，且脈搏迅速，有幾個人發輕微的咳嗽。哈夫金檢驗他們的胸膛——前部和後部。他把頭向病人的身體屈下去，雖然沒有面對他的呼吸。後來輪到伍醫生檢驗了，他只檢查後部，同時把頭抬得很高，以免傳染。他在這病室裏的十幾分鐘，實在感到慌